

近代红茶改良先驱“宁茶振植”的创办经营与历史定位

马建强 郭松宇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晚清以降,华茶外贸形势严峻,中国红茶出口在国际茶叶贸易格局中更显衰落之势。政府、茶商都在寻求改良华茶、挽回利权的途径。1915年,经粤籍茶商、当地富绅以及行业精英的动议,联合在宁茶产区江西修水县以“宁茶振植”为品牌筹办茶叶公司,经过购置山场、垦复茶园、营建厂屋、采买设备等筹备过程,至1918年初具形制并进一步招股集资,正式成立“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自1919年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短期生产运销后,即面临多重困境。资本结构的局限、从技术到经营模式的改良失败,甚至是经营倒退到旧的茶贸体系,都显示它未能真正实现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公司的跨越。加之华茶外销形势的整体恶化、战争破坏等因素,加速了它的破产。宁茶振植的这段历史一定程度上可以刷新学界过去的认识和判断,而宁茶振植的个案也启示后人在考察近代茶业改良的问题上应具有多维视角。

【关键词】宁红;宁茶振植;江西;红茶改良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5-0082-14

The Improvement, Establishment and Positioning of the Pioneer of Modern Black Tea "Ningcha Zhenzhi"

MA Jianqiang GUO Song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oreign trade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 had been severe, and the export of Chinese black tea had shown a trend of decline in the international tea trade pattern.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ea merchants were trying to find ways to improve Chinese tea and regain their interests. In 1915, with the initiative of Cantonese tea merchants, local wealthy people and industry elites, a tea company named "Ningcha Zhenzhi" was founded in the Ningcha producing area of Xiushui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After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purchasing mountain fields, reclaiming tea gardens, building factories and purchasing equipment, the company took on a more concrete form and further raised capital by issuing stocks in early 1918, officially becoming the "Ningcha Zhenzhi Co., Ltd." The company started real production in 1919, but soon faced multiple difficulties. The limitations of its capital structure, the failure of its technological and business model improvements, and even its retreat to the old tea trading system all indicate that it failed to truly leap to a modern capitalist company. Moreover, the overall deterioration of the foreign sales situation and war damage in the Chinese tea industry accelerated its bankruptcy. The history of Ningcha Zhenzhi can refresh academic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in some degree, and the case of Ningcha Zhenzhi also inspires examina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modern tea industry improvement.

Key words: Ninghong Tea; Ningcha Zhenzhi; Jiangxi; black tea improvement

[收稿日期] 2023-02-11

[基金项目] 湖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HBQN0109)

[作者简介] 马建强(1988-),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编审、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文化史;
郭松宇(1998-),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

茶叶曾是中国特有的经济作物和农产品,也一度是最受国际社会欢迎的中国特产,有过辉煌繁荣的对外贸易历史。但自1888年以后,华茶输出渐趋衰落。1892年在出口产品总值中曾占比高达53%(1875)的茶叶比重退至25%。仲伟民指出“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茶叶贸易的衰退不仅仅是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更重要的是其绝对值也开始大大减少”,茶叶作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大下降^①。此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持续走低,出口数量急剧跌落、市场总危机爆发、世界茶叶大国的地位彻底丧失^②。茶史专家陶德臣认为:“民国茶业及茶叶对外贸易在沿续晚清茶业衰落的历史惯性方面走得更远,衰落情况更为惨烈”,最终“走入曲折破产的境地”^③。近代中国出口茶叶,以红茶为绝对主导,论者以为红茶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④。中国近代出口红茶主要分为福建小种红茶和工夫红茶,祁红、宁红、宜红是驰名中外的出口工夫红茶的代表。

在晚清至民国不断延续的茶业衰落历程中,红茶改良成为中国茶业自救的一项重要行动。在早期红茶改良中,宁红产区的“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茶振植”)曾被寄予较高期待,被认为在行业革新中具有重要地位。1917年汉口茶业公所在对俄国政府茶叶调查专员的回复中认为日本、锡兰茶原不能与中国茶相比,但因制造得法、外观美善而后来居上。中国茶“将来于制造之法加以改良,各地之茶皆有凌驾日本茶西伦茶之希望”。汉口茶业公所认为中国“乡民自种自地,地基广狭不一,产茶零星出售,无联合之名称”,并专门介绍了倡试改良的“宁茶振植”称:“现成立一改良制种茶公司于宁州地方,牌名振植公司,用机器仿印度制造,纯用改良新法。”^⑤1918年海关报告说到:“中国茶业,按照新法改良制造,为期不远。安徽省已由农商部提倡设立茶叶试验场,宁州茶叶振植有限公司,已创用机器制茶,中国模范种茶有限公司,近亦力求改良种植之法”^⑥。可以看出“振植公司”创办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改良茶叶,战胜外人”^⑦,以谋求茶业复兴,时人称许为“国内仅见的制茶工厂”^⑧。后来的调查者认为该公司“购备制茶机器,自辟茶园”,“求由栽培,制造,以至贩卖,相提并进,谋整个的发展”^⑨。研究者也大都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宁茶振植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一个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经营”的茶叶企业^⑩,是“现代化的茶叶公司”^⑪。更有论者以为宁茶振植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传统茶叶贸易经营体制的解体,闪现出现代企业制度的曙光”^⑫。

但是事实上,代表民国早期红茶改良的行业先锋“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十分惨淡,改良远悖预期,最终衰败破产。宁茶振植从民国初年引入机器制茶到放弃机器改用手工;从规模化自产茶叶到分庄收茶,其作为改良先锋开拓的近代化生产在经营实践中呈现出明显的倒退,因此它承载的“茶业改

①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21年,第294页。

② 参见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③ 陶德臣:《民国时期的茶叶对外贸易》,《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④ 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第284页。

⑤ 《汉口茶叶(业)公所对于俄员调查之答复(续昨)》,《大公报》(天津)1917年9月20日,第2版。该“答复”在当时被广泛转载,影响甚广。

⑥ 陈道谦:《中华民国七年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中华民国七年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上海通商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19年,第34页。

⑦ 《江西修水县茶业》,《农商公报》1917年第3卷第7册。

⑧ 钱承绪编著:《华茶之研究》,中国经济研究会,1940年,第53页。

⑨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1932年,第22页。

⑩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另见万振凡、吴小卫:《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⑪ 张芳霖:《九江开埠与江西区域市场的转型》,张建民主编:《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5页。

⑫ 吴东生、朱修南:《万里茶道上的宁红茶》,《中国茶叶》2016年第9期。

良”希望也宣告破灭。目前,对于可以管窥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和茶业发展历史的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缺乏严谨、翔实的历史考察,仅有江西地方茶人黄崇焘的一文粗略介绍,且几乎仅是摘抄俞海清1930年代的调查报告^①,对宁茶振植的创办经营经过、改良方式、失败原因的研究既不充分,也不准确。正是由于学界一直未能从历史背景和原始资料出发还原宁茶振植的发展历程,才导致前述研究者对其性质判定上的夸大与失真。本文通过新挖掘的史料对该公司的创办、改良、失败及历史定位等问题进行全新的、细致的考察,以期改变学界的既有认识。

一、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历史背景

汪敬虞在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时认为:“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陵替,归根结底是中国茶叶生产的落后”,同时提到“民间商人也有过从事机器制茶的试探,但大都试而未办,流于纸上谈兵,至多也只是‘一隅试办,无裨全局’”^②。宁茶振植即是茶商在修水一隅试办的产物,它的产生与此地曾经的茶叶贸易历史、茶业改良先声有着深厚的渊源。

(一)清末民初宁茶产销日趋衰落

宁茶之名源于其产地义宁州,因以红茶著称,所以又称宁红茶。义宁州之修水、铜鼓、武宁同为宁红的产地,其中修水产量最大、茶质最好。据清同治十二年(1873)《义宁州志》记载:“道光间,宁茶名益著,种蒔殆遍乡村”,“每岁春夏,客商麇集,西洋人亦时至”^③。刊刻于同治八年的修水文人冷采芸诗集《小洞山房诗草》留存了不少关于茶贸的诗,如《接茶商》:“问道修江来广客,春水满江泛大舶。艾城居民喜且狂,衣裳楚楚立岸侧。”^④记录了春茶上市时粤商沿河而来,两岸茶农喜迎茶商的盛况。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作《做红茶》一诗对农户制茶、市茶进行了生动描述:每年春芽萌发后“修江山户哗然喜,一枪一旗古有名。儿童妇女争先取,只恐一夜添新茎。带露收来似绿云,纷纷野圃对馀曛。或以手揉或足舐,细蕊卷荷吐奇芬”,诗中描绘当地茶农以一芽一叶(即《大观茶论》之“一枪一旗”)的新茶芽为贵,带露争采,以日晒萎凋,进而揉制。所产茶“煎水艳胜桃花瓣,登场气似兰麝薰”,品质上乘。又载茶市热闹景象:“入市窃听市人语,今年茶价增数倍。叶叶白玉霏,片片黄金蕾。一囊茶博数囊钱,看看先卖后多悔。黄田犀津客拦途,城内茶贾引领待。路傍堆钱如粪土,踉跄济济问山户。今日交君钱,明日红茶将我。山翁低首细思量,若还增值方肯许。”这种繁荣的茶叶贸易给当地农户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收益,以致“争笑山棚乐且闲,不买肥田多买山”^⑤。

但至光绪中后期,修水茶业已经颇为颓败,表现在茶叶生产上“各乡所种茶树,不知培植之法”,又逢印度、锡兰茶在世界市场上异军突起,以致“州茶疲滞异常”,有时还遭遇产量不足“茶叶不旺”的困境;表现在茶业经营上则是“州人并不自设行栈,专恃外来客商贩运,任其抑勒,亏折不少,行销既滞,山户自益疲敝”,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茶务衰败,历十余年”^⑥。这种衰败与整个晚清茶业发展趋势相一致。

① 参见黄崇焘:《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考——我国最早农、工、商一体,初精制联合茶叶企业探源》,《农业考古》2011年第5期。此外,王芳丽的《茶叶与社会——以近代修水宁红茶为个案的研究》(2008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和姚丹的《民国江西茶业改良研究》(2019年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仅据俞海清的调查报告《江西之茶业》的内容进行了简单梳理。

② 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99页。

③ 王维新修、徐家杰纂:《义宁州志》卷八,万鸣皋编著:《江西旧地方志茶业文献汇考》,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96页。

④ 冷采芸:《小洞山房诗草》,万鸣皋编著:《江西旧地方志茶业文献汇考》,第102页。

⑤ 冷采芸:《小洞山房诗草》,万鸣皋编著:《江西旧地方志茶业文献汇考》,第97页。

⑥ 傅春官编:《江西工农商纪略·南昌府·义宁州·农务》,万鸣皋编著:《江西旧地方志茶业文献汇考》,第104页。

在印度、锡兰茶主导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江西红茶(其中以宁茶为大宗)步入民国后衰退之势仍难挽回。民国十七年(1928)的江西红茶出口量相较民国二年(1913)已占不到一成^①。茶界以为“宁茶以墨守旧法,不求改良,茶树过老,质味低劣,其受国际市场之淘汰,而日趋于衰落者,固意中事也”^②。冷采芸道光年间观察到的当地农户弃农务茶“不买肥田多买山”的现象,已经转换为1917年前日本东亚同文会调查者看到的“此处附近虽制茶业兴盛,不过是农民副业”^③。

(二)粤商深入参与宁茶的贸易和改良

在传统茶贸时期,粤商已深度参与宁茶外销,与宁茶发展深有渊源。光绪初年,广东茶商韦子丰、郭佩堂等人到江西义宁府指导红茶精制,宁茶大受欢迎、外销遂开^④。光绪年间,广东茶商至江西宁红茶区,称“径运出洋,不经汉口洋人之手”,因此,“本地绅士即与该商订约,将西乡产茶山岭二十余里,勘定界址,一并租与粤商三十年,由该商入山自行采办”^⑤。可知,历史上广东茶商一直在生产技术上指导宁红精制,此外,广东茶商一方面直接参与宁红运销,另一方面在当地租茶山自行采制,跳过中间商进行宁茶产销环节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晚清粤商在宁红地区的茶业经营活动是民国初年宁茶发展的重要原因。

茶贸一直被各界视为制衡列强的重要“商战”手段,道咸时便有“以茶制夷”之说。19世纪末,实业救国的理念逐渐兴起,茶业被视为中国商战的一大转机。然而印度、锡兰红茶的崛起挤压了华茶的销售空间,影响了修水茶贸,所以晚清义宁州牧便多次表示要“求改良而挽利权”“讲求焙制”“除积弊而保利权”^⑥,宁茶改良振兴事业就此发端。粤籍茶商陈翊周在梳理宁茶改良的情况时有如下记叙:

宣统元年,经商栈禀求,农工商部拨款数万交由地方官督饬该地绅董茶商实力整理,以冀一年小效,三年大效,一处创办,处处仿行。……经商栈联同绅董暨各栈各大茶号捐垫万余,串购就大批肥料,如菜枯豆饼等类,散给山户。奈款絀固难普及,而奸猾园户竟领取肥料私自价卖他人培壅稻田,或私以肥料培壅杂粮,仅贪目前小利,虽有良法美意而成效莫睹,官绅概不得力,园户尤为丧心。^⑦

这场由清廷发起,地方政府督办,商绅合力,普通山户践行的宁茶改良以失败告终,却是宁茶改良实践的先声。

20世纪初,中国茶业界的不少人士开始提倡华茶改良,力图重新进占世界市场,宁红作为茶叶外贸中大宗且优质的商品,在遭受外贸冲击的同时也被寄予挽回利权的厚望,粤籍买办出身的茶商以及各重要茶叶产地、中转地从事茶叶生意的富户都是推动这项动议的重要力量。当时中国茶业的发展,尤倚重于广东、上海、汉口的头部茶商的商业布局。风云际会下,粤籍茶商与江西宁茶的碰撞,共同促成了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登上历史舞台。

(三)宁茶振植公司创办者的早期构想

以改良为目标的公司,大抵是改良思想的产物。粤籍茶商陈翊周(后长期担任宁茶振植总经理)在具体筹办宁茶振植公司前,多次发表文章、演讲呼吁茶业改良,从中可以窥探宁茶振植公司创办者的改良构想。

① 参见万振凡、吴小卫:《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研究》,第135页。

② 上官倬:《江西修水县之茶叶》,《工业通讯》1937年第1卷第20期。

③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江西省·义宁州城》(1917年),万鸣皋编著:《江西旧地方志茶业文献汇考》,第100页。

④ 参见方翰周、梁熹光:《修水茶业调查》,《江西农讯》1936年第2卷第5期。据载:“清光绪十年间,又有粤商韦子丰、郭佩堂等亲至各乡指导精制,出品益见优良,最高售价达一百二十两。”

⑤ 李文治编:《近代中国农业史资料 第1辑 184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50页。

⑥ 傅春官编:《江西工农商纪略·南昌府·义宁州·农务》,万鸣皋编著:《江西旧地方志茶业文献汇考》,第103—104页。

⑦ 《陈兆焘上农林部条陈改良茶务呈文(续)》,《时报》1913年2月13日第4版。

1903年,旅美考察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将托拉斯主义引入中国,对当时的实业改良思潮影响颇深。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致函各地商会征求改良茶业的建议。汉口茶业公所的徽商单致中上《改良华茶说略》一文,痛陈茶业产业链过长、中间环节过多的弊病,又进一步提出改良的最大阻力在于“茶栈、茶号、茶户分为三概”,认为“不将三概联成一气,未可与议改良”。因此他建议:“莫如设立总公司,兼出产、焙制、运销而包举之”,具体而言即以“资本充足之公司,不拘宁祁、两湖,先择一埠入手,逐渐推广他埠”^①。数月后,陈翊周发表《上海谦顺安茶栈茶业改良议》以示呼应,陈翊周肯定了单致中对“三概”的判断,指出中国的“小茶号”无法与印锡的“大公司”抗衡是华茶衰败的重要原因,但“设立总公司,买山辟地,兼出产焙制而包举之”又谈何容易,因此他认为应从小处着手,“先由江西之义宁州,购备豆饼或菜枯,招茶户(即园户种茶之人)认领,自行栽培茶树”,并通过犁土、耘草、下肥三种办法对茶田进行精耕细作^②。由此可见,此时陈翊周已有在宁州试行茶业改良的构思。

辛亥革命后中国实业进入新变局中,1912年11月12日上海《申报》新闻《各部记事种种》称工商部拟“设茶叶托辣斯专以提倡茶叶之输出为主”^③。此后不久,恰逢农林部计划于1913年2月开农林大会,对外征集意见,“力图整顿,宏猷硕画”^④。陈翊周即以其对改良茶务的意见上书农林部,专门论及宁红的现状与改良发展:

此外产茶各地,无一处认真讲求,尤以江西之义宁州为甚,……以至收成锐减,价格陡低,年来亏折之巨,以此路为最。……今大部实力提倡,应先从此路入手,或派专员,或咨由赣督,选派妥员亲历该地,会商公正绅董、茶商,先拨官款数万金,购定肥料,妥订章程,仍以犁土、耘草、下肥、取暖四条为主脑,通培旧树,补栽新树,年年如此,勿使间断。果能遵照办理,则一年小效,三四年必有大效,一处有效,他处自然仿行。盖新树四年可摘,茶好价廉,自能畅销。^⑤

陈翊周对宁茶衰败的痛心是其主张改良的重要原因,改良的思路首先在讲求种植、养护茶园上,并且透露出先易后难,逐步发展的改良思路。如果说宁茶振植的创办者陈翊周此时改良宁茶的构想还只是对国人主张创办茶业托拉斯的模糊回应,那么1916年陈翊周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华茶公司便是创办茶业托拉斯的尝试,而1915年开始筹备的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正是该托拉斯计划中“先择一埠入手,逐渐推广他埠”的先锋试验地。

二、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经营考述

尽管该公司的现存资料缺失严重,但通过已有资料仍可勾勒出宁茶振植坎坷的创办经营之路。从我们搜集到的史料来看,宁茶振植的大致活动时间在1915—1932年。

(一) 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

过去的研究多认为宁茶振植开办于1915年,该时间界定以及公司早期筹备情况最重要的史料依据包括如下:

其一,1917年2月15日出版的《农商公报》第3卷第7册“近闻”之《江西修水县茶业》,其中说道:

① 单致中:《安徽茶商单致中改良华茶说略》,《申报》1909年8月22日第4张第2版。

② 《上海谦顺安茶栈茶业改良议》,《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0期。

③ 《各部记事种种》,《申报》1912年11月5日第3版。

④ 陈翊周:《陈兆焘上农林部条陈改良茶务呈文》,《时报》1913年2月11日第4页。

⑤ 陈翊周:《陈兆焘上农林部条陈改良茶务呈文(续)》,《时报》1913年2月13日第4页;陈翊周:《陈兆焘上农林部条陈改良茶务呈文(续)》,《时报》1913年2月14日第4页。

前岁^①有粤东钜富唐吉轩等,邀集本地绅富卢凤逸等,在县城发起一种茶公司,以期改良茶叶,战胜外人。当时定章拟集资廿万元,由发起人担认其半,先以七千元购地布种。去年复由卢君等亲往粤、沪各埠,调查各种改良办法,以资借镜。缘唐吉轩等在沪、汉各地开有谦顺安钱庄,资本一项原甚易易,所欠惟人力与制器两种,制造法应行研究耳。……闻该公司已定今春着手布种,并因入股者众,拟将资本扩充至五十万。^②

根据这条史料,可知1915年,即有粤商唐吉轩等和本地富绅卢凤逸集资设种茶公司,目的在于“改良茶叶”。1916年,卢凤逸调查各种改良办法,1917年,开始布种新茶。“本地绅富”卢凤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年9月《大公报》所载之《汉口茶叶(业)公所对于俄员调查之答复》已经介绍振植公司^③,可见其很早就名闻业内。

其二,我们新发现1918年初(正月)该公司为招股印制的《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图说》所附之《创办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布告书》:

乙卯年(引注,即1915年)在宁州之白鹄坑地方购有山场十里地,殊荒落,林木丛杂,野草隐人。遍询邻近土人,金称廿年前本有土著数百家,迭经三次瘟疫,纷纷迁徙,以后人迹罕到,然旧有之茶株甚夥等语。仆等遂广招工人积极开荒,果随处发现茶苑,瘦瘠已极,乃剪去枯枝,锄松泥土,加以肥料,复广下新种……今旧树新株非常发育,其旧苑约有十八万株,本年却可收获,其新种及购入旧苑移种者,计有百余万株,藉肥滋长,日见壮茂,明年后年,逐渐发芽,次第可摘,故赶建厂屋,购运机器,纯用新法,改良制造……^④

该布告书之目的在于为公司招股集资,其中也透露1915年购买山场(已荒废之茶园),并经开荒、剪枝、补肥、植新等工作,而时至招股之时,仍在赶建厂屋、购运机器等^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布告书后具名者有五人,分别是唐吉轩、陈翊周、卓镜澄、陈玉麒、张躔五。唐吉轩为广东茶业巨头唐氏家族成员(广州府香山县唐家村人),早期在汉口经营茶业,参与谦顺安茶栈经营和上海华茶公司创办;陈翊周即陈兆焘,忠信昌茶栈创办者,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称为“经验丰富判断明察之中国茶商,为上海茶叶贸易之领袖”^⑥;卓镜澄是广东茶帮机械化生产茶叶的先锋人物,在1916—1917年间于上海创办顺隆茶厂,“为国人创设机制茶厂之始”^⑦;陈玉麒亦是粤商,受谦顺安茶栈委派常驻宁州,并开办谦厚昌、公慎隆茶庄;张躔五即张桂辛,为义宁籍人士,曾求学并任职于复旦公学,同时在修水开设贞记茶庄。发起招股者未见前述史料中的本地富绅卢凤逸。

其三,1916年刊载于《江西省农会报》的《宁茶》简要介绍了张躔五在修水开垦茶园筹备公司的情况:

修水县贞记茶庄主人张躔五君,在该县发起改良茶业公司,讲求培茶方法,……召集山户,……按数支配肥料,令山户施用培壅……^⑧

三个月后,《大公报》刊登了《江西宁茶发展之先声》,提到了张躔五与唐翊卿等人引进机械、广种茶树之事:

江西修水产茶最优,洋商呼为宁茶,近因树老失培,产额顿减,真(贞)记茶商张躔五慨然以为宁山土质最宜于茶,为全国冠,未忍任其失培,暴弃足以竞争世界之产品,于去年曾垫洋数千

① 在章有义编纂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 第2辑 1912—1927》中,整理者特别在前岁后注了如下内容“[一九一五]”。

② 《江西修水县茶业》,《农商公报》1917年第3卷第7期。

③ 《汉口茶叶(业)公所对于俄员调查之答复(续昨)》,《大公报》(天津)1917年9月20日第2张。

④ 《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图说》,1918年,第1—2页。

⑤ 从《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图说》收录的照片上显示的时间和工程进度可知,1918年初厂屋仍未完工。

⑥ [美]威廉·乌克斯著、中国茶叶研究社社员集体翻译:《茶叶全书》下,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第58—59页。

⑦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第99页。

⑧ 《宁茶》,《江西省农会报》1916年第6期。

元,分给山户购料肥壅,藉资提倡,旋又组织一公司买山自种,规画机器制造,得粤商谦顺安唐翹卿等(唐乃茶业之巨擘)极力赞成,今已买山田万余亩,布茶秧一二百万株……^①

依此史料张躔五作为义宁本地在沪商人,对于宁茶改良和推动机器制造也做了不少尝试,成为本土茶商与沪粤客商之间的纽带。

其四,稍后一些关于该公司创办之史料则出自俞海清 1930 年代调查后所著之《江西之茶叶》,其中说道:

宁茶振植有限公司系粤商唐吉轩、陈翹周、陈玉麟等所创办,缘以前清光绪年间,陈玉麟氏受上海谦顺安茶栈派委驻宁办理放汇事宜,并设谦厚昌茶庄于宁州之城西、公慎隆茶庄于漫江采办茶叶,嗣以我国红茶受印锡等茶竞争之影响,销路日滞,宁州所受影响尤甚,衰退更剧,欲谋改进以期发展,于是于民国四年集合茶界同志,筹集资本规元十三万两,组织该公司,购备制茶机器,自辟茶园……^②

俞氏以今思昔,是面对一个失败的茶企作历史的追溯,自与前几则材料有所不同。以上关于宁茶振植早期创办的史料,时间或近或远,论说的主体也各不相同,存在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正提醒我们宁茶改良以及宁茶振植创办的历史或许不见得如后人观察或想象的那般简单。这些史料不经意地透露出不少历史细节,从中可以看出该公司之创办先后牵涉了不同的利益主体,既有本地富户、本籍沪商,亦有外籍客商(粤商)、行业巨头。该公司之备建筹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也先后经历了不同利益主体的主导和利益重组,包括茶园、资本、技术的重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本地富户、本籍沪商还是外籍客商、行业巨头都共同汇聚到宁茶振植的创办中来,并且该公司在筹建过程中,形制和性质随各不同利益主体的加入而逐渐明确,可谓经历了茶场—茶厂—茶公司的变化。

综上,对于该公司创建时期的历史可大致描绘如下:1915 年,汉口、上海的茶商及他们在宁州办茶的代理商和宁州本地的富户茶商都开始动议改良宁茶。首先经历购置荒废茶山、进行复种的“购场垦复期”;随着参与投资主体的扩充,1917 至 1918 年初,进入“集资建厂期”,一是广种新茶、二是扩充资本、三是建厂购机,但直至 1918 年元月时厂房仍在建设之中^③。1918 年 4 月 2 日《新闻报》载《宁茶振植公司开股东会》的新闻,公司共集资 11 万两,股东大会成立时有股东三十余人,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董事、查账员若干,附股五千两以上的大股东均列为董事。公司总经理作为公司经营人由董事会任免,第一任总理由唐吉轩担任^④,至此公司完成最初之公开招股,成为一个茶叶股份公司。《农商公报》刊布 1918 年 4 月 10 日“令江西实业厅厅长”,称“据呈已悉,查该公司此次所报改正章程大致尚无不合,应准注册,合行填发执照一纸”^⑤,可以说至 1918 年 4 月,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才正式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成立。由“场”至“公司”不是一蹴而就,进入正式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并有产出则应更晚。该公司从最初几人动议购地开始,迭经茶场垦复、茶厂建设等项,这期间在公司的历史上都只能算是筹建期,而未进入生产期。实际上,1918 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仍只是试制少量新茶。1920 年有报道称该公司“去年收成约百数十担”^⑥,则该公司真正有意义的生产应自 1919 年始。从正式注册获准并试制茶叶成功的 1918 年而论,该公司绝不能如此前一些研究所言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资本主义茶企,其机器生产更是晚于上海。过去之所以特别突出 1915 年这一时间,一是这年恰逢中国茶叶在美国旧金山获得“太平洋

① 《江西维持茶叶之计书》,《大公报》(天津)1917 年 1 月 4 日第 2 张第 7 页。

②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 22 页。

③ 据《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图说》中的第三十四图、第三十五图、第三十六图、第三十七图可见当时仍在建设中。

④ 《宁茶振植公司开股东会》,《新闻报》1918 年 4 月 2 日,第 3 张第 1 版。该年公司第二次股东会经全体董事投票决定将经理更换为陈翹周。

⑤ 《令江西实业厅厅长》,《农商公报》1918 年第 4 卷第 10 期。

⑥ 《宁茶振植公司内幕》,《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7 日第 3 张第 11 版。

万国博览会”金奖,振奋中国茶界;二是这年农商部开始推动茶业改良,设立“农商部茶业试验场”,颇有示范效应。或许也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催生了作为宁茶改良先锋的宁茶振植。

此外,就已有史料所见之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主体较多元,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沪商,大都为粤籍,且与粤籍茶商在沪开设的著名茶栈谦顺安有密切关系^①,该公司以买办出身的粤籍茶叶大王唐氏家族(唐翹卿、唐吉轩)为核心,联合了卓镜澄、陈翊周等行业改良先锋,而这些人正是1916年创办的上海华茶公司的重要人物。据当时《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Review)观察者的描述,“这家公司(引注:指宁茶振植)的成立是上海谦顺安茶栈多年经验和实验的结果,该茶栈由唐翹卿先生于1868年成立,他的儿子和侄子是主要股东之一,不仅是新茶公司的股东,也是宁州茶园的股东”,而成立公司、建立茶园的目的在于“销售自己的茶叶,在自己的种植园里种植,完全由自己的机器生产”^②。同时该观察者认为,“华茶公司现在正准备开展大规模的业务,成为世界包装茶贸易中的一个部分”^③。可见,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即粤商茶业托拉斯计划中的一部分,是以唐氏为主导的上海华茶公司发展计划中的一个茶叶生产基地。

(二)茶税政策的起伏与公司免税的波折

减免茶税之呼吁,自清季华茶危机后日出不穷。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的1915年,经时任农商部部长周自齐等人的批准,降低茶叶出口税20%,然而无补于华茶衰落之大局。公司开始真正有规模生产的1919年,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北洋政府又免除外销茶两年海关税厘。这其中以上海茶业公所为首的社会组织在争取免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茶业公所的代表人物唐廷枢、陈翊周等,要么直接投资宁茶振植,要么与之关系密切。因此,宁茶振植争取免税之事是茶企寻求政府支持的一个代表。

1919年陈翊周以上海茶业公所之名,上书北洋政府,痛陈窘况,希望政府“俯念商艰,豁免出口华茶国内一应税厘,俾可竞卖稍挽利权”^④。后经北洋政府许可免税,据上海茶商陈兆焘等“呈请减免华茶出口税厘各案”,“现经部处一致议决,凡所有出洋华茶应准暂免海关二年,其内地一应税厘亦予一例核减五成,以示体恤”^⑤,免税政策适用至1921年。1922年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又电请农商部免除公司税厘,农商部将免税事宜转达财政部,财政部商议后再下达江西财政厅,“所有应纳赣省内地厘税应予减免,除令行江西财政厅核议具复外,咨复查照等因合亟批示转行知照”。经理陈翊周“以为必可邀准”^⑥,但终究是“为赣省财政厅所阻,事未果行”^⑦,令免税之事石沉大海。1923年,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致函上海总商会、国货维持会,由总商会两次代电请求农商部和江西财政厅免除税厘,在多方努力下,1924年宁茶振植又获准免除一年税厘,1925年又请求继续免厘一年,最终“姑准展期一年,限满不得再行援请,以示限制”^⑧。此前所请在江西省便未执行,此后结局亦可想而知。除厘金外,修水地方保卫团还逼迫宁茶振植重复缴税,此外警卫捐、保卫团枪支捐、修理南山岩以及其他杂捐有增无减。以至后来的调查者俞海清感叹道:“可见内地,稍有势力之土劣,即耀武扬威,任意敲剥,实为工商业发展最大障碍也”^⑨。

以宁茶振植的微观视角具体视之,茶税征收者大致有二:一为地方势力,以征税之名行强盗之实,动辄以武力相逼,各类杂捐出自其手;二是国家财政,征收税厘,但收税实权在地方手中,若地方加以掣肘,

① 参考张燕华、周晓光:《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

② Chinese Plan to Modernize the Tea Trade, The Far Eastern Review, January 1918, pp.3-5.

③ Chinese Plan to Modernize the Tea Trade, The Far Eastern Review, January 1918, p.5.

④ 《提倡华茶豁免厘税》,《申报》1919年10月16日第2张第7版。

⑤ 《减免华茶出口税厘之部令》,《申报》1919年9月25日,第3张第10版。

⑥ 《致财政部函》,《劝业丛报》1922年第2卷第3期。

⑦ 《宁茶振植公司内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7日第3张第11版。

⑧ 《宁茶振植公司续免厘一年》,《新闻报》1925年3月12日第4张第1版。

⑨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37页。

免税之事往往杳然。客观来说,宁茶振植从1918年后开始生产,至1927年陷于停产境地,绝大部分时间都有惠税政策,只是农商部免除地方厘税扶持商业的初衷得不到地方的贯彻。宁茶振植作为闻名业界的改良先锋,加之公司投资者大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能争取的政府扶持绝非普通经营个体可比,但捐税问题从公司经营者反复吁请的文字来看大有影响全局之势,个中原因实值得探讨。

若以每担最高三两的税厘计^①,1919年公司“收成约百数十担”^②,则税厘不过三百余两,结合1923年该公司所述厘金“每年约五百两”,则此项税赋与该公司1918年招股之总资本11万两相衡,远未到耗尽资本的程度,更不应对公司全局造成影响。其中缘由,可从以下史料洞悉。1919年陈翊周在第二届股东年会上报告的公司经营状况称:“现有新旧茶株约百万,桐子已下种者七万,旧茶株因去年发芽稀少,概将全干芟去,本年收入必仍不丰,然出产必秀嫩,预计新株则民国十年开始收获,十一年渐旺,十二年大旺,此前开荒工巨,用费浩大,以后为培壅时期,渐能节省。”^③由此可知,此前募集资本在开荒方面耗费较大,而旧茶产量低、新茶一时无法采摘,致使公司产能受限。1923年,公司申请免厘税请上海国会维持会代电称,1919年前“公司方面因开荒辟土,艰辛备尝,所集资本,耗折过半,继以纳税过重,成本较大,运销更见亏折”。又上海总商会的代电说:“溯创办之初,开荒辟土,历尽困苦艰难,集股十万两,历年折阅,计至十一年终止,本金用尽之外,尚揭入万两之巨,若停办则前功尽废,若进行则无米难炊,进退失据,惶迫万分。”^④为谋求免税,公司难免夸张诉苦,但这电文中的情况也大致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由此,真正让资本11万两的公司因500两左右厘税而窘迫的原因在于,公司前期投入过大,又因茶叶生产之周期性和短期产量不高,造成公司前期运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未能产生效益,资本已经折损过半。此后虽艰难维持亦是不断亏折,最终导致资本耗尽并有负债,最终连维持经营亦有困难。后来调查者俞海清认为:“股东方面,皆系普通商人,以商业之眼光,看待兼具农工商三项性质之茶业,抱早投资,晚获利之观念,认为该公司无利可图,不愿增加股本,继续进行,以致大好事业,不能发展”^⑤。投资者以商业眼光而求成交获利,在于买卖与获利的及时性。而该公司兼具种植(农)、机制(工)、运销(商)三者,资本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资本回报与产品产销密切相关。前期投入占总资本比重较大,后续没有追加资本,产销无法跟上,诸多原因致使经营彻底失败,其中税厘相对而言是该公司在维持阶段中的巨大负担。

(三)茶业近代化改良的尝试

宁茶振植成立之初衷,在于用新法制茶,核心是引进近代化生产以对抗印度、锡兰茶叶,其改良之法主要体现在:规模化种植、机械化加工、一体化产销、近代化管理等四个方面。

在种植方面,资料所见宁茶振植并未进行茶种改进,主要是养护旧茶树和种植新茶树,该公司所拥有之茶园有1500余亩,茶树有1766624丛^⑥,在种植规模上堪称浩大。这主要是模仿印度、锡兰茶园进行

① 参考陈翊周:《整理华茶意见书》,《申报》1929年1月17日第24页。意见书中提到“民国八年以后,海关税虽系全免,厘金税亦减半征收,但合计亦须在一两以外。加以厘卡留难、地方需索,每担茶税所费,仍在二三两之间。”为计算厘税可能最大值,以三两计。

② 《宁茶振植公司内幕》,《民国日报》1920年4月7日第3张第11版。

③ 《宁茶振植公司开股东会》,《新闻报》1919年3月30日第3张第1版。

④ 《宁茶振植公司请免税文电》,《新闻报》1923年5月15日第3张第1版。

⑤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38页。

⑥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27页。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上海版)的《茶商改良制造》与《茶业改良成效》皆称“买山万亩”;1920年发表于《民国日报》(上海版)的《宁茶振植公司内幕》称茶园面积有十里、两千亩;1933年发表于《申报》的《修水茶业改良场近况》称宁茶振植“拥有二千余亩广大之茶山”;1936年公司最终拍卖时根据《民国日报》(江西版)所载《修水振植公司刷新经营》宣称“有茶山三千亩”,以上说法分歧显见。大体而言,该公司应该在修水广购山地(应远多于实际开发的茶园),后因资金不足不能将全部山地建设为茶园。1932年俞海清调查茶园为1595亩,可信度较高,朱祖晦在《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一书中也称1500亩,故取1500亩说法。

大面积垦殖以达规模化种植的效果,这被当时的外国观察者视为“The Plantations”(大种植园)^①。从今天可见的该公司茶场的照片亦可明确感受到当时方圆十里高山丘陵遍植茶树的盛况。但是印度、锡兰的规模化种植建立在大资本投资和政府支持的双重基础上,计划长远、实力雄厚。宁茶振植的投资者虽已是当时中国的头部茶商,但资本追加乏力。规模化种植的成本回收周期往往很长,没有长期稳定的持续投入很快就会陷入周转不灵的窘境。

在加工方面,毛茶生产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四道工序。对此宁茶振植进行了一系列改良。为解决雨天不能进行茶叶萎凋的问题,卓镜澄借鉴阿萨姆萎凋室的经验建设萎凋室,由其绘制的厂房图纸附带的文字说明如下:“厂之后段楼下焙茶房,热气自下上升,复从吼散出,而厂之前段正面墙中藏有机器扯气风扇,将机关启发,能吸热气,经过中段之楼上摊菁处,约三四钟时间,鲜叶之潮气已去,变成柔软性质,随即放入捲菁机内捲结成条,此法以热气代太阳。”^②这种设计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所载印度、锡兰的萎凋方式相同。但在后续生产中因“萎凋室未能尽善,不便应用,故仍照普通茶户晾青方法”^③,只能以旧法日光晾晒。揉捻是制茶中最能显现人工与机械差距的部分,一台好的揉捻机可以代替70人的工作,并且能使揉捻均匀,而不触及人手,保持产品的卫生^④。宁茶振植陆续引进英国揉茶机、日本揉茶机、国产仿印揉茶机,但始终不能高效运用,至1933年时只剩英国揉茶机可以使用,并且4台揉茶机需要20~30名工人^⑤,所耗甚繁。发酵流程则仍依靠人力和日光,“将已经水干之叶,入竹籬内,压紧之,上覆以布,置日光,或焙房,任其发酵,及至色泽变红,嗅之略有果熟香时,即取出解散”^⑥。而阿萨姆厂家在发酵室内置喷雾器,对温度与湿度进行精准把控。干燥是毛茶制作的最后一步,印度及锡兰也曾“沿用我国日晒方法”,但稍后即普遍使用干燥机^⑦。宁茶振植“茶叶干燥法亦如普通茶户,薄布于晒簞,利用日光晒之”^⑧,再移入焙房烘烤。虽然宁茶振植一直以机器生产标榜,但就毛茶生产的具体流程来看,机械化程度不高,效果不理想。

在产销方式上,宁茶振植企图将过去“茶农—茶商—茶庄—茶栈”这样一条漫长的茶叶产销链进行整合,实现植、制、售一体化。将生产分为茶园种植、茶厂加工两部分,覆盖茶树种植、茶青采摘、毛茶加工、箱茶制造的完整种制流程。但在运销方面,宁茶振植与修水地区的普通茶庄无二,“所有茶叶由坑口装民船”,“运至九江交忠信昌九江分栈,报关转装长江大轮,运沪”^⑨,宁茶振植并没有摆脱茶栈这一中间商,反而要依靠茶栈经营,如此看来,该公司在茶叶生产链中所担任的角色与茶庄相比进步不多。

在管理制度上,宁茶振植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经理制,但所谓“经理”更多只是一种称呼(民国中期九江普通茶栈的负责人也被称为经理),近代经理制的最大意义在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唐吉轩、陈翊周都是宁茶振植公司的大股东,并不是近代化的职业经理人。生产中具体的管理人员分为三类,一是茶厂管理者,二是财务管理者,三是茶园管理者。茶厂由“管庄”负责,下属焙师、工头、制菁厂以及肩拣与看拣,各厂工人分为上手、中手与下手,工头通过上手对工人进行管理;会计分为工账房、毛账房与伙食账房,分别负责公司的工资支出、生产支出与伙食支出;茶园管理者分为管茶、茶园督工,负责茶园的日常生产;机司与其助手负责机器的运作、维护^⑩。该公司的生产运营中出现了较为鲜明的分工,

① Chinese Plan to Modernize the Tea Trade, The Far Eastern Review, January 1918, p2.

② 《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图说》, 1918年, 第37页。

③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 第31页。

④ [美]威廉·乌克斯著、中国茶叶研究社社员集体翻译:《茶叶全书》上, 中国茶叶研究社, 1949年, 第153页。

⑤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 第31、32页。

⑥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 第32页。

⑦ 《印度锡兰茶之制造与包装》,《江西合作》1937年新1卷第11/12期。

⑧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 第32页。

⑨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 第38页。

⑩ 参见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 第36页。

但分工的专业化和近代化程度都不高。

受各种限制,宁茶振植的改良措施或与实际扞格不入或未能有效落实或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尽管也显露出了一些进步之处,但仍不免透露出该公司心余力绌的改良窘况。

三、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失败及历史定位

1937年,时人上官俤在调查修水茶业时观察到“多数茶农茶庄,咸心灰意懒,将从前赖以生之茶丛,置诸不闻不问,任其荒芜枯宿,甚至将原有茶丛悉数伐去,改种他种农作物”^①。此前的1933年,经俞海清、吴觉农等人提议,由上海、汉口商品检验局牵头租赁原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改为江西修水茶叶改良场,公司名存实亡。上官俤调查前一年1936年,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财产以5000元的低价拍卖给修水商人王颂虞^②,公司宣告彻底失败。

(一)失败原因

关于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的失败之因,俞海清总结有四:首先,公司没有得到地方的支持,“当地人士,不明该公司之设立,对于该县民生经济有莫大之利益,予以相当之协助,反以为利权外溢,处处掣肘”。其次,经营者决策失误、投资失当,“公司于办理之初,进行过急,茶园尚未养成,即行大规模建造房屋,购备机械,及至茶园开采之际,又值洋庄茶市低落,运销方面,营业亏损,以致资本用罄”。再次,技术上“缺乏专门人员,设计指导,故种种设施多有未合理处”。最后,是创办经营者的“皆系普通商人”,“公司办理人员,求适合各股东之需要,未免过于商业化”致使对“根本之茶园,不能注全力以培养之”^③。1936年武汉大学教授朱祖晦出版的 *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 一书在振植公司经营者方面的不足则说得更为直接:“组织者仅仅从盈亏角度对商家感兴趣,过于急切地等待利润,当没有收到任何股息时,他们变得沮丧,不愿意继续努力。”^④实际上,俞海清仅是从现象层面来总结,这种现象背后的实质才是宁茶振植失败的根源,这便是近代茶业的投资结构。近代茶业在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之前,首先是一种买办经营模式和由买办经营模式过渡或转型而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农产品的商业化),具有“伴随市场扩展而来的不断增加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特点^⑤,买办资本家的主导更凸显了这种商业资本主义的不成熟性,投资逐利、无长远计划、抗风险能力和意识不强等资本的结构缺陷是宁茶振植先天性的不足。

此外,从当时茶业的整体角度来看,自印度、锡兰茶异军突起,华茶出口量便整体下滑。1917年英国禁止华茶进口,1919年宁红出口的重要对象俄国也因十月革命爆发,市场萎缩。尽管当时部分红茶商人试图改制青茶,尝试出口转内销,但国内销路亦狭隘,销售数量有限,价格低廉,行业整体不景气。茶业一行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在时代的骤风急雨中备受打击,民国初年投资宁茶振植的头部茶商们,要么在商海沉浮中落败(如唐吉轩、卓镜澄)^⑥,要么认为无利可图而不愿意继续投资。

从区域环境来看,1927年后修水被卷入红白战争中,资金不足加上战争带来的交通不便,宁茶振植一度陷于停产境地,原先“公司初开办时常川驻员,办理制茶园等事宜”,但“自民十六年以后,以营业失

① 上官俤:《江西修水县之茶叶》,《工业通讯》1937年第1卷第20期。

② T.H.Chu: *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6, p. 58.

③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38、39页。

④ T.H.Chu: *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 p. 58.

⑤ 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⑥ 据《珠海名人故事集》中《悬壶济世唐淑之》所记唐吉轩因不精外语上当受骗,数万两银子的茶叶,换来几箱不值钱的沙俄卢布,导致破产,家产变卖一空;又据《旧中国的工商金融》记载,卓镜澄遭怡和洋行的算计,洋行以该批茶叶没有销路为由拖延茶期,还要计算栈租损失,致使卓镜澄倾家荡产。

利,为节省开支起见”,仅在茶季派员办理必须事务,茶季之后除看守人员外“其余职工均行离场,此亦不得已之紧缩政策也”^①。至1932年反“围剿”战争激烈时,时人认为“修水茶产岌岌可危”^②,修水的正常商业活动几近消失。

从公司投资经营的角度来看,经营者对市场前景过于乐观,低估了运营成本,在建设初期就盲目扩张茶园,宁茶振植的茶园除部分从茶农手中购买外,大部分由公司雇工开垦,“垦荒每亩约须十工,工资约三四元,所种种籽,系由本地及祁门所购办,共计需种子三千担,每担价洋一元五六角”^③。除建造成本高昂以外,维护成本也很高,每年茶园施肥需3000元,除草一次也需3000元,前期开发的规模化茶园变成了沉重负担。公司重金投资的制茶机器也未显卓荦,本来宁茶振植生产流程的机械化程度就不高,而最能节省人力的揉茶机又因“压盘过重,其压力轻重,不能调节”致使“四机共须三十余人”^④,毫无效率。

从技术引进的角度出发,宁茶振植的机械技术并未成功落地。如上文所述,在毛茶生产的流程中,宁茶振植的萎凋、揉捻等环节都曾引入机械生产,但最后都倒退回手工作业,原因有三:第一,缺乏技术人才,引进的技术无法改进适配,公司只能抛弃机械生产,倒退回手工生产的传统方式;第二,买办资本为主体的投资者,无坚定信念和抗风险能力,遇到发展障碍即进行经营收缩和倒退,停止近代化的探索,回归到更熟悉、更有盈利可能的传统模式;第三,近代化、机械化的生产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中,区域的封闭、人口的流失、政策的巨变随时都会发生。疾风过岗,伏草惟存,相较于昂贵笨重的机器,传统手工业更适合在乱世中生存^⑤。

从改良效果的角度看,宁茶振植提升茶叶产量、质量的目标也未实现。民国调查者预估修水地区的茶田亩产毛茶约为20斤^⑥,宁茶振植茶园1931年前的亩产鲜茶量约为60斤^⑦,但早在1880年代,锡兰茶园平均每亩出茶产量便达80斤^⑧。尽管公司茶园较之普通茶农产量较高,但与南亚的英式茶园差距巨大,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未等茶树成熟就早采,破坏了茶树的正常生长;二是资本耗尽,无法对茶园进行有效维护;三是自然条件的差距,锡兰采茶不论四季,而华茶却受季节掣肘。在茶叶质量上,初期的茶园积极种植新树、修剪老树,注重鲜茶质量,1921年到沪的宁茶振植新茶令“购者极为满意”^⑨,但由于后期对茶园缺乏维护、不增添新茶树,至1930年代,未见盈利的经营者“忽视了种植,导致茶叶质量下降,并反映在市场上”^⑩。经营失利的宁茶振植后期倒退到分庄收茶的传统模式,茶叶质量和产量更无法保障。

内外交困下,宁茶振植最终失败破产。该公司的失败是近代企业制度、生产技术等进入中国本土试验遭遇挫折的缩影,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①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26页。

② 《修水茶产岌岌可危》,《新闻报》1932年3月18日第2张第6版。

③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27页。

④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31、32页。

⑤ 关于此类“倒退现象”。汪敬虞在论述近代农业机械化时曾提出农业机器使用过程中的“回头”、“倒退”,参见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它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第163、164页;仲伟民在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茶叶加工时,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茶叶加工业仍基本维持原来的传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在某些已经采用了机器加工的地方,竟然也相继放弃新技术和新机器,再次恢复到原来的传统手工操作方式上去”。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第334页。

⑥ 李园之:《宁红产销概况及今后复兴意见》,《经建季刊》1948年第5期。

⑦ 俞海清编著、吴觉农校阅:《江西之茶业》,第28页。文中提到“每年所采鲜叶量以前约十余万斤”即1931年以前鲜茶量约十余万斤,调查中宁茶振植茶园共遗1595亩,以此为计,估算亩产量约60斤。但1931年“仅八万斤”,亩产量约为50斤。

⑧ 参考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9页。

⑨ 《宁茶振植公司新茶到沪》,《时事新报》1921年6月25日第3张第3版。

⑩ T.H.Chu: *Tea Trade in Central China*, p.58.

(二)历史定位

宁茶振植失败的实质是一条改良路线的失败,该公司集中展现出晚清以来茶界(尤其是茶商)对于近代化生产优势的认识与追求,主要有三条:一是在制茶方式上追求“新法”,即用机器制茶、建立近代化茶厂;二是在产业体系上追求“整合”,即整合产业链将“大规模茶园与机器制茶厂联成一气”^①从而建立“合植、制、售三者组织强有力公司”^②;三是在行业上实现统一追求同业“团结”、集合资本、扩大规模,以“茶业之托辣斯”外御其辱。

后来的调查者在审视宁茶振植及其失败原因时,多从客观外因和经营失误的角度出发,并不注重改良本身的问题(例如技术是否有生利性、模式是否有可行性、改良是否有可持续性)。这是受民国茶界对茶业发展的理念影响所致,认为引入新的制度、升级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就能够夺回世界市场。因此,被视为机器制茶的近代茶业改良代表宁茶振植,即使近现代化因素的优势在其具体生产中并未显现,也往往被认为具有重大价值。

如前文所述,宁茶振植于1915年开始筹备,历时三年从最初类似“种植园”的茶场发展为拥有完整生产能力的茶厂,再经1918年公开募股、开股东大会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茶叶公司,至1919年开始进行规模生产。从其发展历程看已不能称之为“第一个资本主义的茶叶企业”。至于能否称为“资本主义”企业,从其创办者视之,宁茶振植是传统商资、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的典型个案;由其经营管理视之,该公司所展现出的雇佣关系、不完全的经理制、较为细致的生产分工,确有资本主义的元素,但这种资本主义不是中国近代化中举上下之力追求的“工业资本主义”,买办主导的不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经营并没有带来“传统茶叶经营体制的解体”。相反,宁茶振植的坎坷经营中的具体实践恰恰证明了旧的茶贸体系在当时仍具有巨大的惯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它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受阻后退而求其次的“安乐窝”,进而影响到近代茶业改良的历史进程。可见,汪敬虞、仲伟民等前辈提出的“倒退”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生产的技术运用方面,还延及整个行业的经营方式上。

以今视之,由传统茶商、买办所创立的宁茶振植,其经营生产建立于传统的旧茶贸之上。作为脱胎于旧茶业的经济个体,宁茶振植保留了大量旧茶贸的经营传统,乃至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即便如此,该公司仍是近代茶业改良的一次勇敢尝试,诚如唯物主义发展观所认为,旧事物包含着新事物的胚胎和幼芽,新事物遗留着旧事物的残余和影响,宁茶振植正是那一朵包含着大量旧残余的新幼芽。

余 论

从红茶改良的宏观视角出发,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是红茶改良前后期的一个独特连接点,它上承民国初年商人们的实业浪潮,下接20世纪30年代由国家主导学者参与的茶业改良,较为完整地经历了民国初至抗战前期的茶业历史。从宁茶振植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身角度看,自创办之始,公司便面临重重枷锁,或困于资金、或困于战乱、或困于生产,一困再困,令人叹惋。这其中买办资本的历史功过、生产经营的制度流变、茶业改良的失败之因值得深度探索。

近代以前,茶叶一直是中国的“土贡”,手工精致的生产惯习造成中国好茶普遍量少而质精,被视为“珍品”,又因长期为社会上层所享,而被赋予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内涵。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19世纪以后,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伴随西方世界对茶叶需求量的激增,茶叶从传统中国的“珍品”逐渐向平民消费的世界产品转变,中国手工制茶的方式不仅难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质量标准也无法得到保障。西方近代资本所主导的印度、锡兰茶叶,因其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彻底的工业化产品,以

① 黄柏权、曾育荣主编:《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汇编 宜红茶区卷初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页。

② 黄柏权、曾育荣主编:《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汇编 宜红茶区卷初编》,第65页。

全季供应、品质稳定、成本低廉等特性迅速抢占世界市场。从相当程度上说,近代洋茶对华茶的优势就是工业制造对手工业的优势,是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对不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的优势。

综上所述,华茶振兴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茶叶质量、产量的提升,更要完成茶业从手工业向工业的转变,将茶叶变成工业制品,进而进入世界市场竞争。这也提示我们,在考察近代茶业改良时,对改良的道路选择应有长程的观照,尤其不应仅关注生产技术,还应关注产销模式以及推动改良的资本与资本背后的力量,这是近代茶业改良问题的关键。显然,在宁茶振植这个近代茶业改良的个案上,过去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宁茶振植历史的重新认识,不仅仅是让其历史实现真实的回归,而且也启发我们在评价近代时期茶业改良的过程中应具备多维的观察视角。

(责任编辑:胡文亮)

(上接第81页)

的敏感神经,户部为维护财政收入与地方大吏的钱粮博弈尤为激烈。关于士绅力量,苏松地方士绅尤其是冯桂芬及潘氏家族与晚清最具实力的地方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密切交往,凭借社会网络积聚成强大而有效的社会资本,将朝野力量拧成一股合力,促成减赋顺利完成^①。而南京士绅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逃难过程,家族人员与财产损失尤为惨重,普遍缺少如常州“复员绅士”或苏松士绅投身地方重建的“精英能动主义”,遑论耦合京官、地方督抚及地方豪绅各种力量,以个人权力网络积聚社会资本推进减赋的能力^②。江宁地区各级地方官员的减赋呼吁因得不到京官呐喊呼应,又缺乏地方士绅有力配合,时常陷入左右掣肘、举步维艰的境地,只能一再搁置。

此外,江宁府不属于明清时期江南重赋区,赋额低于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尤低于苏松两地,从未纳入明初至清前期江南官绅呼吁减赋之列^③。这也是晚清朝廷屡次驳斥江宁府援引苏松成例减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江宁府地贫多山,战争期间又因地处孔道蹂躏最重,垦熟速度缓慢,赋税复额极为困难。故朝廷要求按原额起征丁漕时,江宁各级地方官委实难堪催征钱粮的考成压力,不顾户部严词驳斥一再呼吁减赋。朝廷鉴于江宁府旱蝗交加,强征原额不过徒有虚名,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社会动荡,也只好折中求全,最终同意减免上元等五县三成漕粮,又豁除高淳、溧水两县十余万亩沉湖虚粮。考察晚清江宁与苏松等地减赋诉求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细致了解江南地域社会内部的差异性,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晚清江南减赋运动中朝廷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而不是简单以“督抚专权”“绅权上升”一概论之。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徐茂明:《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 曾京京:《复员绅士与太平天国后常州的重建》,《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罗晓翔:《“十二年漂泊,三千里往返”——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南京士绅家族的生存策略》,《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2、13合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39页。

③ 朱声敏、范金民:《钱粮博弈:明到清前期江南减赋呼吁及其效果》,《史林》2018年第4期。